

# 作为观念现象的文字:中西审美思维源发机制探微

王 妍

(哈尔滨工业大学 媒体与设计艺术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文字的“音”与“形”是观念的“现象”存在。文字的音—形二重现象给文字记录观念的方式提供了两种选择。汉字从“形”出发,兼及字“音”,包蕴“意象”,以“相类性”为原则,形成超越具象的汉字“字象”系统;汉字“字象”具有虚拟隐喻的“象性”、具身性和透明性。西文字则弃“形”择“音”,以“任意性”为原则,形成了能指/所指关系的符号“声象”系统;西文字“声象”具有语境诠释的“像性”、离身性和遮蔽性。文字是“构成性的语言”,左右着组织信息和概念表征的方式。现象学的观念开启了重新观察文字的视角,启发通过文字形态的独立考察比较中西文论差异的可能性,探索文字所蕴含的思维力量,观照中西审美思维的源发性生成机制。

**关键词:**字象;声象;象性;像性;意象;仿佛

**中图分类号:** H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4)05-0081-07

## 引 言

现象学家胡塞尔认为,为观念服务的介质——文字是“构成性的语言”,是“精神性的身体”。而“被构成的语言”是事实性的,是文字所促成的观念对象<sup>[1]</sup>。德里达进一步指出,思想史上一切所谓终极性的形而上学范畴都是文字所促成的观念对象,不仅是科学世界的,也是一切文化世界的。现象学的观念为我们开启了重新观察文字的视角,启发了我们通过文字形态的独立考察比较中西文论差异的可能性。中西审美范畴作为文字促成的观念对象,是汉字和西文字系统“构成性的语言”所构成的“事实性”的语言,中西文论作为“被构成的语言”,其组织信息的方式和整合信息的表征系统是被中西文字形态所左右的;文论,无论是重意象的古代中国诗论还是重语言的现代西方批评,都无法摆脱文字与观念的纠葛。

对于中西文字所造成的中西审美观念的差异,似乎西文化背景的学者们讨论得更早些。早在20世纪初年,美国文艺理论家欧内斯特·F·费诺罗萨以他对汉字的敏感洞察,发表了一篇题为《汉字作为诗歌媒介》的文章,试图从汉语的文字层次进入语言层次,再进入诗学层次建立“汉字诗学”。他认为汉字的形象性,及其包蕴着运动、隐喻和弦外之音的特性,使汉字成为比西文字更为理想的诗歌媒介。他还进一步指出,中西文字的形态差异造成了中西诗歌创作的思维方式的差异<sup>[2]</sup>。

20世纪80年代,海外华裔学者叶维廉进一步指出:象形的汉字“以象构思,顾及事物的具体的显现,捕捉事物并发的空间多重关系的玩味,用复合意象提供全面环境的方式来呈示抽象意念”,“代表了另一种异于抽象字母的思维系统”<sup>[3]</sup>。而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晚了一步,但在本土文化的

收稿日期:2014-05-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技术现象学视域下文艺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2BZW01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意象与仿佛——艺术表意范式的中西对比与当代建构”(10YJJA760059);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模仿与虚拟的技术现象学研究”(11D088)

作者简介:王妍(1965—),女,吉林怀德人,教授,文学博士,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背景下,对汉字的理解则更加深入精髓。画家石虎先生在1996年第一次提出了“字思维”<sup>[4]</sup>概念,从第一次思维的角度来阐释汉字,讨论汉字思维问题,对于思考中西审美文化差异颇具启发。

中外各时代学者们各自言说的语境和研究的方向虽有不同,但从不同角度开启了中、西文字形态与中西审美差异之间内在关系的研究。我们认为,文字形态及其文字思维,对于审美观的影响是规定性的,文字不仅仅是观念的肉身,它还是观念和思维的本体,也是思维的方式。观念及观念的表述由包括文字在内的语言所决定。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尝试以文字现象学的方法,探索文字所蕴含的思维力量,观照中西审美思维的源发性生成机制。

### 一、“字象”与“声象”:作为观念的两种“现象”

从初民“结绳而治”,到后世圣人“造书契”,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从记号和记忆辅助物到图画与观念完美结合,文字终于完成了它的华丽蜕变。文字史上的“一熟期”文字也即“意音文字”,最初都是具有图画特征的象形字。这些象形字都是在原始巫风时代强化、传播、传承观念的需要推动下,更强、更系统地形式化活动的结果,因此也被视为神秘的“圣书字”。从古埃及的圣书文、古中国的甲骨文、古苏美尔的楔形字、古印度的纹章、到中美洲的玛雅文字、南美洲复活岛的“说话板”、“科哈乌·朗戈朗戈”(rongorongongo)、早期希伯来的经文等等都是象形的圣书字。这些文字在原始仪式中,是图画,也是咒语、祷词,是视觉的也是听觉的。文字的“音”与“形”是“感觉极”——仪式中强化、传播、传承观念的重要感知形式,也是文字的“理念极”——原始观念——的现象存在。透过视觉与听觉形式的“感觉极”,人才能领会“理念极”神圣的意义,才能对人的社会行为、情感、价值观加以引导和控制。

文字作为观念的“音”、“形”二重现象,给文字在记录意义的方式上提供了两种选择方式:以“音”为介质的文字系统或以“形”为介质的文字系统。根据各自地域文化的语言需求,文字形态发展的结果大相径庭:汉字从“形”出发,兼及“声音”,形成超越具象的“字象”系统,西文字则弃“形”择“音”,以音拟义,形成了符号思维的“声象”系统。

## 二、汉字“字象”的“象性”与西文字“声象”的“像性”

### (一) 汉字“字象”的“象性”及其虚拟性

汉字以“字形”表意,与以音表义的西文字是不同质的文字系统;汉字之“形”具有语义的主导性,意义可以只与视觉记号“字”联系、只在视觉层次上表达和传递,而与相应的音声记号没有必然的联系;因形而义是汉语言的特征已成为共识。然而我们认为,把汉字定义为字形表意的文字系统,并未从根本上把握汉字的本质。事实上汉字不仅在“形”——视觉层次上、而且在听觉层次、行为层次、甚至精神层次上表达和传递意义,这完全有赖于汉字的“象性”特征。

汉字的“象性”源于古代汉文化中占卜活动的思维活动。考古可见,最初的甲骨占卜是烧灼甲骨后观其兆纹、解读兆象(神意、观念),后来又发展为占卜之后刻字其上,以记录对神的问卜及其结果。甲骨“纹”与甲骨文——兆纹之“象”与文字之“形”互补见义,兆纹之“象”是神示的观念,与之互义的甲骨文字则自然具备承载甲骨“纹”神示之象的能力。神示由“兆象”转由“字象”传达,从兆纹之“象”到汉字构形之“象”的发展,是汉字真正意义上具备“象性”的发端。因此,说汉字是以“字形”表意的“象形”文字系统是不确切的,汉字是以“字象”表意的“象性”文字系统。试看甲骨文和古埃及圣书文的区别:同样是象形字,汉字是“线”式象形,圣书体是“体”、“面”象形,如树,汉字写作:𣎵,圣书字写作:𐎎;鸟:汉字写作:𪇐,圣书字写作:𐎎;坐:汉字写作:𠂔,圣书字写作:𐎎。前者甲骨文具有高度的全知性和简单性;再如居所:汉字写作“𡩇”(亚形:古代地下穴居形,全体象形);圣书体写作“𐎎”,(竖形,寺院、城、墓,全体象形);车:汉字写作“𨍎”、圣书体写作“𐎎”<sup>[5]</sup>。汉字的“形”是全知视角获得的“象”,超越了感官(眼睛)所见之“形”的局限,而圣书体则局限于眼中所见事物的具体之“形”。字之“形”与字之“象”完全是两个层次上的观念。可见,同样是象形,西方的古代象形文字以眼见为实,摹绘眼所见之“形”,中国古文字已在事物具象之“形”的基础上实现了虚拟之“象”的超越。不仅如此,汉字的“象性”不仅体现在“形”之“象”,还体现在“音”之“象”。以音求义是中国古代的训诂之学的方法之一。“训诂之旨本于音声……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王念孙:《广雅疏

证自序》)例如“像‘供、恭、拱、拱’这类形声字的声符都含‘双手托物’的义类”,“这些形声字说明,不同的‘象’中隐含有一个共同的义类”<sup>[6]</sup>。声符在这里充当了“音”之“象”。因此,以“相类性”为原则,汉字的“音”与“形”共同构成了汉字的“字象”。重“象”的汉字不仅是眼中所见之“形”,还包括耳闻之“声”,是心灵对感知的全面整合和整体把握,是认知主体意向性活动的结果。古汉字在创制之初便非仅止于象形,“在本质上是写意而非写实的,它们并非是对事物的忠实模仿”<sup>[7]</sup>,而是创造性的事物虚拟之“象”。

从春秋战国之际到秦末汉初,汉字完成了从“一熟期”向“二熟期”的转化。汉字的“象性”并没有因为文字形态的简变而改变,反而在不断的规范化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品格。约公元120年,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以“六书”和540个不同的部首对所有的汉字进行了归纳、分类整理,使汉字形符和声符表意示源功能理据化、理论化,为千年而下的汉字构形演变定下原则与基调。汉字“象形”、“象事”、“象声”、“象意”的构形原则创造性的结果,形成了汉字“形象”、“事象”、“声象”、“意象”——无往而不适的、在中国文化中备受推崇的汉字“字象”系统。汉字造字从“形”出发,兼及字“音”,包蕴“意象”,成为一个有形、有事、有意、有声的“多媒体”,形成超越具象的、全方位的“象性”系统,规定了汉语以“字象”为思维介质、象象并置、“势多不定”的时一空完形的思维意向结构,赋予了汉字语言为媒介的中国意象美学虚拟性审美的文化特征。

## (二)西文字“声象”的“像性”及其模仿性

西方文字形成的过程,就是西文字放弃对事物“形”的描绘,以“声象”为思维媒介的过程。如前所述,面对无限纷繁的大千世界,以古埃及圣书体为代表的古代西文字绘形模态的方式显得十分有限,为此他们不得不为象形文字不断地增加表音、表意的冗余符号,也许正是这种冗余和繁复,使他们转而选择了以“音”为思维介质的符码化道路。约公元前两千五百年,苏美尔书写系统中的所有的图形要素几乎全变成声音单位,这种语音书写迅速影响了埃及,并经由埃及、腓尼基的北方闪米特人进一步改造,抽象的辅音音素文字的字母符号逐渐定形,大致在公元前十世纪前后,希腊人接受“腓尼基字母”并改造为“希腊字母表”,“希腊字母表”则成为各类西文字生发的源头(此时中

国的中原大地,殷商甲骨文已经成为汉文化成熟的文字系统)。到了公元前一世纪,经罗马人将“希腊字母表”稍加改造,成为几乎已经完全合乎拼音原理的“拉丁字母表”<sup>[8]154</sup>,(而这时正是中国秦代,古汉文字第一次规范化和简化的小篆文字体系完成)。语音书写的习惯最终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世界书写的轨道,进而形成了西方文化的字音思维方式,创造了东西方并立的世界文化格局。

由象形字一变而为拼音字,西文字“书写发展的关键步骤是音化,也就是从图像过渡到音标符号”<sup>[8]28</sup>。最本质的变化是字形与字义的分离。“解决之道就在于‘整体语音功能’,也就是有系统地整合声音和象征(包括图画文字),以便创造‘符号’。一旦象征的音值开始在有限的系统内取代语意的地位,图形象征就变成书写系统的符号了。这切断了系统外部参照物的关连,并且赋予该系统新的潜能……这一来,人们看到图形象征(或图画文字)不再只是认知系统外的指涉对象或抽象观念,而是开始读出声音,这意味着那个语音具备了独立的价值。”<sup>[8]31</sup>从以“形”表意转化成以话语“声音”的差别为义——送气与不送气、阻塞与不阻塞、清音与浊音,声音在文字系统中占据了优势地位。语音的差别在表意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因强调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分离性而将所指悬置,形成了符号的任意性原则(索绪尔)。也就是说,文字之形只是“音”的识记符号,文字之形与意义的关系渐行渐远,西文字的“声象”(音响+字形)与“所指”(观念)之间的关系缺乏根据或不可认证。“声象”(sound—image)成为其所指涉的概念(signified)的“像”,语义需要通过“声象”转化,而文字只是意义的“仿像”,这便是西文字的声像的“像性”。

与汉字象象组合、“势多不定”的“象性”不同,西文字由文字的线性特征和上下文的语法逻辑造成“声象”的“像性”。西文字由某些字母按线性排列组成一个单词,呈现出“线性”特征,在视觉上表现为一维的线性文字。而语义则是在这样的线性逻辑中获得。按照鲁道夫·阿恩海姆所言,西语言“是词在一个维度上(直线性的)连续排列,因为它被理性思维用来标示各种概念出现的前后次序”,“一个接一个地按顺序结合在一起”<sup>[9]</sup>。以希腊字母为原型的西方表音体系的文字,整体语音功能的观念——声音之“象”是靠字母的线性排列

和识记符号的线性解读完成的,其中格、位、性、复数、时等等要素和前缀、后缀等冗余符号,是语义的重要识读标志——话语只能透过有限的符号系统来仿现语义。西方思想的语言科学都“将语言(它的客观性领域)的不可还原的单纯本质确定为语音、词汇和逻各斯的统一体”<sup>[10]40</sup>。而表音书写和线形书写方式以及语法的线性逻辑,则牢牢地桎梏着西文字的“声象”,文字成为事物的符号标记,即事物的“仿像”。

因此,西文字“像性”的本质是模仿。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指出了字母文字的线性思维及其“声象”模仿的本质。他说:“一个名称……是用声音对被仿物(mimeitai)的摹仿(mimema);摹仿者(mimoumeno)通过声音称呼他所摹仿的事物(mimeitai)。文字具备表现“实质”(ousia)的潜力(organon)。”(《克拉底鲁篇》426C)。此后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时期里,西文字是“存在”本身的“摹本”的观念成为西语言文化的理论根基,西文字与“原本”的对应关系成为自足的横向关系系统,这个关系系统即表现为“模仿”性。这造成了文字在西文化中的二元悖立的身份:一方面,正因为“声象”与意义的任意性原则,西文字“声象”对语言的表现是独断的,它决不是语言的“外在形象”或自然形象,而是一个“仿像”系统。“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摹写出来。”<sup>[11]51</sup>另一方面,正因其独断性,西文字“声象”又被认为是僭越的——如索绪尔所言:“文字与文字所再现的言语如此紧密地以致文字最终篡夺了主导地位。”<sup>[10]49</sup>字符与语音千缠百结,以至于通过反映、转换和倒置的效果,言语似乎成了“最终篡夺主导地位”的文字的反射镜。指代与被指代的东西混合在一起,以致人们说话时就像在写字,人们思维时,被指代者仿佛不过是指代者的影子或反映<sup>[10]49-50</sup>。并且“文字本质上是外在于语言的内在系统”,是“对语言的再现”,“污染”、“甚至败坏”“语言的内部系统在概念上的纯洁性”<sup>[10]46</sup>。“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件假装”<sup>[11]56</sup>,文字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所驱逐、压抑和贬斥。因此,西文字从产生以来便陷入一种尴尬的悖论中:一方面文字、字母、可感知的铭文始终被“西方传统视为外在于精神、呼吸、言语和逻各斯的形体与物质材料”,另一方面

又被视为一种“堕落和迷茫的外衣,是腐化和伪装的礼服,是必须驱除其魔力,即用经文祛邪的节日面具”<sup>[10]47</sup>。





总之,汉字与西文字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字象”与“声象”两种不同的文字系统,在中西文化系统中文字的作用与地位也大不相同。汉字的发明被认为惊天地泣鬼神,汉字作为意义的构成,其字象无往而不适;而西文字作为意义的仿像,其命运永远徘徊在独断与僭越的二律背反之中,透露出西方美学本源与仿像二元分立的哲学基调。汉字与西文字的现象学差异,是中西审美差异的文化基础之一。

### 三、汉字“字象”的具身性与西文字“声象”的离身性

触类可为其象,合意可为其征(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汉字构形是一种“相类性”原则的“具身”思维。汉字造字的原则之一“近取诸身”,既是从身体出发,也是“嵌入”世界的身体的认知。姜亮夫在《古文字学》中指出:“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人的眼所见、耳所闻、手所触、鼻所嗅、舌所出的(而尤以‘见’为重要)。故表声以故、以箫管(即居),表闻以耳(听、闻、聪等)……总之,它是从人看事物,从人的官能看事物。”<sup>[12]</sup>而“远取诸物”的原则是从“嵌入”世界的人与物的关系出发,汉字中两性字根、天地字根、动物字根、植物字根、工具字根、生活字根等。<sup>①</sup>大量的事实说明,“取于身又见其为”,“以人的自身肌体和行为通于一切事物,是汉字构形的基本方略”<sup>[13]</sup>。即便是现代汉字,仍能看到它们的词根里面的“感官的相似性”,反映了“汉字构形的主体投射”<sup>[14]</sup>。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字的形成,也是中国人“以身体道”的哲学方式,即是具身“意象”的思维过程。由于汉字可以“画读、歌读、听读、韵读”<sup>[15]</sup>,也即经过视觉感官(眼)、发声感官(口)、听觉感官(耳)、身体感官(身体节律)多通道神经网络的同时激活而实现多感知神经共享,汉字思维模式可以称为具身“虚拟”(embodied simulation)思维模式。当代认知科学研究证明,人类有两种神经元——经典神经元(canonical neurons)和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经典神经元专注于处理三

<sup>①</sup>参见唐汉《汉字密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维的物体的信息,包括形状,大小和空间转向,具备同样的特征的信息都会激发它们,如同一个神经模拟机制(mechanism of as-if neural simulation)神经系统被激活,就如同观察者在和物体交互<sup>[16]</sup>。人类另一种特殊的镜像神经元系统,会在自己执行动作或观察其他个体执行相同或者相似的动作时产生放电,能像镜子一样,直接在大脑中重现被观察对象所执行动作<sup>[17]</sup>。这种个人的和与身体有关的经验性知识使得我们能够理解他人做出的动作,从而理解他们所体验的情绪和感情<sup>[18]</sup>。所谓镜像神经元是指当人类看到事物并尝试去模仿该事物时而处于兴奋状态<sup>[19]</sup>。汉字在笔画框架之中,凝结了人在世界中生命活动信息,成为人类生命活动信息的“标本”,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包含着生命存在的时间、空间和生命活动的“有机”信息,与神经认知规律相符合。汉字即字会心,因声而象,象象并置,激发新义,富于生动的活感性。使人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交互和虚拟的意象思维过程。汉字形为框架、以神为精魄、以心为筋骨的“生命单位”<sup>[20]</sup>构成了“生命符号”<sup>[21]</sup>系统,汉字“字象”的“体验性”使汉语言具有“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的具身思维的规定性。“字象”提供了感官存在的全息性,使汉字成为具身性的文字,字象的展开就是生命在自然中出场。

而西文字“声象”外在与内在、印象与现实、再现与在场的悖立造成了“意义”与“世界”之间的一种鸿沟,这个鸿沟其实是消失的身体。以“头”字为例,“头”的字形由公元前四千年 C 的象形文字 ,经过变形 ,成为楔形文字 ,在约公元前一千年进一步形成较为成熟的楔形文字 。经闪米特人进一步改造形成抽象的辅音音素文字的腓尼基字母,演变为拉丁字母 R,从象形文字到表音文字,“头”的字形经历了象形的意音文字到抽象的音节文字的改变,造成了文字与存在的分离。这一点已经为当代西方学者所觉察。早在 1977 年 Banks, William P 等就已经开始研究人类处理图像和语言的不同点,结论是人类处理图形的信息的速度比处理文字信息的速度要快,而 2010 年美国孟斐斯大学的 Max M. Louwerse 等发表的《概念化认知过程中的语言和具身特性》中进一步指出,具身的天性更适合处理图形相关的认知

过程,语言的天性更适合处理文字相关的认知过程<sup>[22]</sup>。在这里,西方学者所说的语言和文字,是指西语言和西文字,西文字的拼音化、符号化和去身体化,造成了西文字的离身性。西文字的“每个符号都是某种东西的符号,然而并不是每个符号都具有一个‘含义’,一个借助符号而‘表达’出来的‘意义’。在许多情况中人们甚至不能说,这个符号‘所标志’的就是人们用这个符号来指称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指号……意义上的符号不表达任何东西”。<sup>①</sup>西方文字“形式—实体”的二元思维方式,必然导致主客对立的对象化活动,意义的理解不是情动于中的具身思维,而是移情于外的离身思维。西方美学中的模仿论、反映论、自然主义、形式主义、表现主义等思潮,从本质上看都是这种二元思维方式的体现。按照德里达的分析,汉字“字象”可以理解为是观念性的东西,是意向性行为,是可以重复的、使得人们在其中可以提前或回忆整个重复过程的形式,所以生命等于活生生的在场,但德里达指出,西文字的“声音是不能重复的”,即表达一个观念的“声象”不能重复,转瞬即逝,需要“自我”把它唤出来的,只能通过知性达到重复<sup>[23]</sup>。这种二元性造成的“不在场”形成了西方“再现”的“仿像”审美范式。

#### 四、汉字“字象”的透明性与西文字“声象”的遮蔽性

透明性(Transparency)原本是讨论现代建筑和立体主义绘画的批评术语,它并非指物理材质的“透明”性,而是指现象的“透明性”。所谓现象的透明性,是指在任意空间位置中,只要某一点能同时处在两个或更多的关系系统中,透明性就出现了<sup>[24]</sup><sup>85</sup>。以这个观念考察汉字,汉字构型于二维空间,由字根以模块组合的方式在一个正方块内而组成。这些模块之间,并非只按照一个固定视点去表现,模块间形体相交、重叠,体现出多维参照系的空间关系,因此,汉字具有“空间层化结构”的透明性。如合体字“采”、“受”,前者是“爪(手)”与果木的互动,后者是手手相授的关系。“爪”的内涵由与外物互动的作用,扩展到有某种性质或能力,而这种扩展是各部分之间空间构成的“象”实现的。即便是独体字,也体现出空间关系造成的“透明性”。如“屯”字,傅道彬先生认为,

① 参见(德)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年。

屯是春草破土而出之“形”，又表达了草木破土，生命萌生，正是生命嫩弱艰难生长的时候，故有艰难之“象”，又引申为春日草木萌发，万物生长，生生之谓大德的天地之大象；“屯”为“春”的古字，以春芽破土之象，以春天草木萌动生长之艰难来状人生与事业之艰难，以春天乐生顺生的思想表达对生命的祖先的尊重。汉字的空间构型可以左右（左中右）、上下（上中下）、内外（包围/半包围）等等方式，不仅可以体现左右上下的方位，还可以表达前后的方位，如“森”：上下关系还暗含着前与后的空间位置；汉字构件中的“音”部也会与其“形”共同共成时空关系，如“枫”字，左形右音，不仅有秋风过林的空间感，还有秋风染翠的时间感，形声字就具有了听觉的透明性。由音符和意符组合构成汉字的变革，其意义是深远的，更加增加了汉字的透明性：象象并置、音象合媾，使汉字提供了一种超越文字、不落言筌、生命与本真直接交互的意向结构。这绝不是线性的书写所能达成的，正是汉字构形的“透明性”才能形成“大象无形”的至高境界。汉字以“形”“会意”、或者“音”、“形”际会造成的汉字空间，及其赖以组织构建、具体赋形和清晰表达的机制，正体现了现象透明性的精华所在。“这种意象的表现，显现了思想流动的过程。中国古典哲学很少导入纯粹理性的形而上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古典哲学总是立足于以形象为基础的思想阐释传统。……对于中国而言，没有象征没有意象就不可能有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sup>[25]</sup>那么，可以说没有汉字，就没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意象和象征，便没有中国古典哲学和美学。

西文字的线性排挤了空间，失去了人与空间的关系；离身性排挤了身体，失去了人与世界多感知交互的通道。这导致了西文字走向建构一个标识或替代存在的“仿像”系统的道路。在西方语言学中，语音是意义的符号，文字则是语音的符号，文字成为“符号的符号”，这符号层的“仿像”毕竟以字母、语法为其实底，由此而向上建构。西文字在本质上是外在于语言的，它被认为是一种“伪装”，在后现代眼中看来，这种符号本身甚至是一种“暴力”，它迫使逻各斯离开了自身，掩盖了“意义向心灵的呈现”的原始性、自然性和直接性<sup>[10]50</sup>，西文字只能通过词义扭曲、结构重组和语涉双关，才能挖掘出更多的信息，只有“那些有幸体验乔伊斯式‘词汇粘合’的读者”，并且“乐于探索表层叙述背后更深层次的意义”的人，才能因其

作品包藏的意蕴所“深受触动”<sup>[24]25</sup>。可见，西文字建立起一套有严密性与精确性、操作起来容易的逻辑体系，在人与世界之间建立了阻碍，人对世界的本真体验总是“隔”了一层无形的遮蔽，只有通过解释学的方法，才能通达知觉的透明性，体会和理解意义的真谛。

## 结 语

总之，汉字造字从“形”出发，兼及字“音”，包蕴“大象”，以“相类性”为原则，形成超越具象的汉字“字象”系统；其虚拟隐喻的“象性”、具身性和透明性，形成中国语言含蓄蕴藉的意象美学。西文字则弃“形”择“音”，以“任意性”为原则，形成了能指/所指关系的符号“声象”系统。作为中西传统文论表述的两大文字系统，汉字“字象”的“象性”、具身性、透明性，形成了汉语言“意—象”思维的意向结构，赋予了中国传统文论体验性、境域性、整体性、生成性的“意象”观。而西文字“声象”的像性、离身性、遮蔽性，形成了西语言“音/符”思维的意向结构，规定了西方传统文论遮蔽与去蔽、主体与客体、本体与仿像的“仿像”论。因此，如果说汉字诗学是具身性的体验诗学，而西文字诗学则是离身性的诠释诗学。以文字现象学的视角对中西文论差异进行回溯性探问，文字形态及其意向结构的差异，是造成中西意象美学与仿像美学审美范式差异的“潜在内禀性”，形成了含蓄蕴藉的中国意象美与求真求实的西方仿像美学。因此，文字/语言是文论反思自身传统的一个起点和基础，文字（语言）的差别不仅是传统文论的症结所在，而且由于文字（语言）与思维之间的紧密关系，从广义上看，它的深度已经涉及到符号和表意系统整体，汉字的“象性”与西文字的“像性”，是造成中国意象美学与西方仿像美学思维方式及审美差异的滥觞。

## 参考文献：

- [1]JOHN LEAVEY, JR. E. Husserl' Origin of Geometry: An Introduction[M]. J. Derrida, trans.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78.
- [2]周发祥. 西方文论与中国诗学[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72.
- [3]叶维廉. 东西文学中模子的应用[G]// 饮之太和.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1980: 267—268.
- [4]石虎. 论字思维[J]. 诗探索, 1996, (2).
- [5][日]中辻武, 下間頼一, 緒方正則. 古代象形文字和古

- 代技術の研究—漢字と聖刻象形文字に見る豎形象形と平面象形[C]//机械技术史. 北京:1998:47—52.
- [6]徐通锵. 语言论[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302.
- [7]黄亚平, 孟华. 汉字符号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69.
- [8][新西兰]史提夫·罗杰·费雪. 文字书写的历史[M]. 吕健中, 译. 台北:博雅书屋有限公司, 2009.
- [9][德]鲁道夫·阿恩海姆. 视觉思维[M]. 滕守尧, 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7:361.
- [10][法]雅克·德里达. 论文字学[M]. 汪堂家,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 [11][瑞士]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 [12]姜亮夫. 文字学[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69.
- [13]申小龙. 汉字构形的主体思维及其人文精神[J]. 学术月刊, 1994, (11).
- [14]申小龙. 汉语与中国文化[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145.
- [15]鲍盛华. 汉字阅读的独特性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 2011, (5).
- [16]FRANCESCA GARBARINI, MAURO ADENZATO. At the Root of Embodied Cognition: Cognitive Science Meets Neurophysiology[J]. Brain and Cognition, 2004, (56):100—106.
- [17]GALLESEV, FADIGALL, FOGASSIL, et al. Action Recognition in the Premotor Cortex[J]. Brain, 1996, (19):593—609.
- [18]VITTORIO GALLESE. Embodied Simulation: From Neurons to Phenomenal Experience[J].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2005, (4):23—48.
- [19]VITTORIO GALLESE, CORRADO SINIGAGLIA. What is so Special about Embodied Simulation[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11, (15):512—519.
- [20]宗白华. 艺境[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104.
- [21]谢冕. 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37.
- [22]MAX M. LOUWERSE, PATRICK JEUNIAUX. The Linguistic and Embodied Nature of Conceptual Processing[J]. Cognition, 2010, (114):96—104.
- [23][法]雅克·德里达. 声音与现象[M]. 杜小真,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1—5.
- [24][美]柯林·罗, 罗伯特·斯拉茨基. 透明性[M]. 金秋野, 等, 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 [25]傅道彬. 诗可以观[M]. 北京:中华书局, 2010:43—49.

## The Phenomenon of Words as Ideas: Exploration on the Original Aesthetic Thinking

WANG Yan

(The Center of Media and Art Design,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sound" and "form" of words are the "phenomenon" existence of the idea. The sound—form dual phenomenon of the words provides two kinds of choices for writing down the idea. Based on the "form", combined with "sound", Chinese Character formation contains "invisible great image". With the principle of "similarity", it forms the Chinese "character—image" system beyond the physical character. With the nature of the virtuality and metaphor, Chinese Character—image is imageability, embodied, and transparent. Western Words abandoned "form", and chose "sound". With "discretionary" as principle, western words formed the symbol "Sound—image" system based on the signifier and the signified. And with the nature of the ostensive definition and context of the situation, western words which are based on "Sound—image" situation are likeness, disembodied and masking. Characters are the "constitutors", and literary theory is the factual "constituted" statement. The perspective of phenomenology opened a new way for us to observe characters, and inspired us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the Chinese aesthetics through the characters, to explore the power of thinking contained in the words, and discern on origi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esthetic thinking.

**Key words:** characters—image; sound—image; imageability; likeness; yixiang; eikon

[责任编辑:郑红翠]

• 87 •